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再认识

周利生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往往以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遭遇重大损失,没有建立起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依据,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事实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互为促进以重聚革命力量,是中共中央举行南昌起义的目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只是实现该目的的举措而已。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看,南昌起义与各地的秋收暴动实现了“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发动南昌起义的目的。由此观之,南昌起义是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成功;失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059-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06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学术界关于南昌起义的评价,基本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具有重大意义,认为南昌起义对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武装斗争等方面有突出贡献;二是认定南昌起义陷入失败,缘由在于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遭遇重大损失。简言之,学术界基本评价是:南昌起义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但又陷入失败的起义。本文认为,这一观点与南昌起义的史实不符。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动南昌起义,目的是要求这次起义与当时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互为促进,以重聚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如果这个目的实现了,即便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遭遇重大损失,南昌起义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起义。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基本评价:“重大意义”与“陷入失败”

南昌起义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在近代革命史上应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么,关于南昌起义出现了哪些评价呢?

(一)“重大意义”的理论依据

南昌起义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于1927年10月24日发表文章,赞颂南昌暴动及其起义军南下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行动中最光荣最英勇的历史”^[1]。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肯定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2]51-52}。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的时间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8年11

收稿日期:2023-03-22

作者简介:周利生(1968—),男,湖南永州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自我革命研究”(22VRC01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南昌起义以及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所爆发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使中国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而这个新时期则是我们党彻底认识军队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⁵⁴⁸。

新中国成立后,对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依然给予高度评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4]¹²⁵2007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时,胡锦涛指出,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5]。2017年8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将南昌起义置于前所未有的时空领域并给予深刻评价,指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6]。这些评价或出现在党的重大决议中,或是各时期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所作的重要讲话,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都予以了充分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列引的上述评价并未明确南昌起义是成功抑或失败。因为,即便是失败的起义,也不失其重大意义。

(二)“失败”论的视角与局限

学术界对南昌起义在人民军队创建、武装革命斗争、土地革命乃至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等方面的贡献,均给予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基本认为南昌起义是一次失败的起义。这一情况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达广东的潮州、汕头地区时,在强大的敌人围攻下,主力遭到严重损失,起义失败”^[7]⁷³。郭清树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简编》指出,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没有和湘、鄂、赣广大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孤军南下广东遭到失败”^[8]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写道:“历史经验证明,夺取广东,再行北伐的战略方针,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这是起义军失败的基本原因。”^[9]⁸刘国语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教程》评价指出,“起义部队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意义却是重大而深远的。”^[10]²³等等说明,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著作从南昌起义部队军事行动角度,认为南昌起义南下广东过程中遭遇挫折,因此起义陷于失败。

与此同时,对于南昌起义陷于失败的观点,也有学者不予认同。

1982年,南昌起义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张侠在其著作《南昌起义研究》中指出:“之所以颂扬南昌起义,是因为它是一次胜利的起义。就战术而言,南昌起义曾遇到许多挫折、失利与失败,但就战略而言,归根结底,南昌起义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11]⁶⁰⁵张侠还具体列出了南昌起义胜利的四个理由,即:“从思想和路线方面而言”“从‘第一枪’而言”“从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言”“从它诞生了我军而言”^[11]⁶⁰⁵⁻⁶⁰⁶。1997年,南昌起义七十周年之际,有学者分析总结过去十年南昌起义研究的学术进展时指出,南昌起义探索了创建人民军队建设道路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其失败只是起义主力军的失败,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12]。进入新世纪,有学者针对党史、军史著作中“南昌起义失败似乎已成为定论”的现象,在比较了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认为南昌起义是胜利的起义,起义部队南下所遭受的挫折和失利不能抹煞起义本身的成功^[13]。

这些评价都是客观而中肯的历史总结,然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当然,对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壮举,若仅以“成功”或者“失败”这样的二分法来界定或评判,似乎有武断之嫌疑。因此,有学者指出,南

昌起义“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败的一方面”,即:“从成功的方面讲,主要表现在起义后期朱德、陈毅同志的实践活动上,包括‘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他们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意义重大。但是,对‘怎样搞’这个问题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从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来的。”^[14]这些表述应该是对简单二分法的有益修正。

二、目的与举措的辩证法:重聚革命力量与南下建立根据地

事实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互为促进以重聚革命力量,是当时中共中央举行南昌起义的目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只是实现该目的的举措而已。

(一)重新团聚革命力量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这是事实。部队离开南昌南下之前叶挺发表的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以及南下途中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身份发布的告全体官兵书,都对此作了说明。前者分析了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原因,认为广东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状况比较适合革命生存^{[2]24};后者出于鼓舞士气,号召全体官兵“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以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2]34}。

但是,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建立新根据地,是当时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目的吗?通过梳理和阅读相关史料文献,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1928年4月,瞿秋白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在六大开会时印发给全体代表。这份书面报告明确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执行“新的路线”。其中关于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有以下记述:

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即:(一)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二)决定叶、贺南昌暴动之举行……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鄂、赣、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害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员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贺龙)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及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左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奋斗。^{[15]397}

在这里,瞿秋白明确提到,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目的是“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害而散乱的革命力量”。的确,历经“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通过包括南昌起义在内的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害而散乱的革命力量”,成为“新的路线”的目的所在。

瞿秋白在报告中所称的“中央”,实际上指的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12日改组后,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所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6]92}。其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发布的通告称:“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17]247}可见,该常务委员会在当时紧急状态下发挥着决策性作用。

上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五人当中,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等三人在南昌起义后不久就对起义的决策过程有文字记述。那就是:张太雷和李立三在192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南方局粤省委联席会议中,有专门关于南昌起义的两份报告。两份报告同时刊登在《中央通讯》1927年第7期。张国焘在看到张太雷的《中央通讯》1927年第7期报告后,就南昌起义决策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释,这就是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二)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功能定位

张太雷报告的第一部分便是“政策决定之经过”,报告指出:“我们首先说明向[白]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

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2]91} 张太雷报告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央先决定湘粤赣鄂四省秋收暴动在先,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在后;南昌起义是湘粤赣鄂四省暴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以“帮助”土地革命;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以期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并非“单纯军事”,否则就“没有意思”。

张太雷报告的上述内容,从李立三的报告可以得到印证。李立三在报告中提出:当时党的政策是正在准备号召广大农民于秋收时期举行暴动,并在武汉准备反政府大示威。因此就当时形势来说,南昌暴动已是“我党必然应采取的政策”^{[2]76}。李立三在报告中还提出因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依张回粤很少有成功之可能,即使南昌起义军回粤成功,也必然牺牲在汪精卫和张发奎的协谋之中^{[2]76-77}。张国焘之所以在1927年11月致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因为他发现张太雷报告提到张国焘“假传”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而张国焘自认为这一情况“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2]63}。张国焘是否“假传”共产国际指示,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可以肯定的是,意图“根据事实慎重申明”的张国焘既未对李立三报告持有异议,也未质疑本文上述所列举的张太雷报告的内容。

事实上,在当时极其险恶的局势下,中共中央首先想到的应对之策就是秋收暴动。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列举了国民党武汉当局种种摧残革命的行为之后,提出今年秋收时期拟将开展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17]225-226}。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也强调秋收暴动的重要性,指出“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暴动,即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革命任务^{[17]295}。

也正因此,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当日,中共中央致函南昌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明确要求南昌起义要与湘粤赣鄂四省秋收暴动形成互动态势,指出:南昌暴动应与四省秋收暴动“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训令湖南、广东、江西、湖北四省立即进行秋收暴动,以响应南昌暴动^{[17]238}。此处所提的训令即《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大纲提出了“以农会为中心”的暴动战略,并对湘鄂粤赣“每省具体工作”均有规定^{[17]240-243}。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出:发动土地革命是南昌政变的主要目的,南昌政变与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意义“是一贯的”^{[2]41}。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中也同样明确指出,“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18]453}。之所以如此重视四省秋收暴动,是因为在中共中央看来,只有决定湘鄂粤赣四省暴动及南昌暴动的政策,才称得上是“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2]52}。

可以认为,中共中央发动南昌起义目的,是通过南昌起义与湘粤赣鄂四省秋收暴动互为促进以重聚革命力量。南昌起义成功或者失败的评价标准,应该以此为依据。

三、重要意义:南昌起义与各地秋收暴动一起实现了“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南昌起义与湘粤赣鄂四省秋收暴动互为促进,实现“汇合为一贯的斗争”,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为贯彻此战略意图,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告知“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指示广东省委即刻开始接应叶、贺部队,并与前委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互通声气”“并迅速进行为要”^{[2]39}。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军按照既定计划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中共中央在南下部队行军消息“完全未得到报告”的情况下,于8月22日再次致信广东省委,要求东江立即开始组织暴动,政治口号“为叶、贺内应”,并要求广东省委立即派人与叶、贺通消息并为其作向导^{[2]45}。

(一)南昌起义与各地秋收暴动的有效“汇合”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对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秋收起义的计划和大纲,先后在广州、西江、北江、潮梅、海陆丰、惠州成立暴动委员会。8月中旬,中共广东特委负责人赖先声到汕头,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具体领导潮汕地区的秋收暴动。9月中旬,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赴潮汕,指导当地的秋收暴动^{[19]247-249}。在秋收暴动武装的协助下,南昌起义部队顺利攻克大埔县城,占领潮州、汕头等,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

然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部队于10月初遭遇严重损失。针对这一状况,中央要求南昌起义余部之一部“冲入海陆丰与农民结合”^{[21]60}。该部在董朗率领下,“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21]10}。10月中旬,海陆丰县委根据广东省委指示,把这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20]90},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20]92}。该团于10月底与海陆丰农军一道,发动武装起义,占领海陆丰县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7]370}的精神指示,11月中下旬,原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彭湃,先后主持召开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相继成立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20]114-118}。海陆丰农民起义“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记载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21]。随后,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和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通过《没收土地案》《土地决议案》,在县苏维埃设立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实施没收土地的工作;县之下,区设土地科,乡农会设土地委员或由农会直接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从1927年11月开始,到1928年2月止,海丰县分配土地约占80%,陆丰县分配土地约占40%^{[20]130}。这一行动,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认可。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22]8}

除海陆丰农民起义外,1927年8月到11月间,广东共有30多个县举行了武装起义,其中有16个县一度占领了县城,海丰、陆丰、大埔、蕉岭、五华、潮安、汕头、揭阳、澄海、詹县、陵水等县和一批区、乡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出现了“四·一五”后的广东第二次工农武装起义的高潮^{[19]255}。值得注意的是,“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22]8},因为“由军队发动起来的海陆丰群众更为坚决有力”^{[22](P170)}。这里的“军队”,就是南昌起义部队!可以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有力促进了广东的秋收暴动,基本实现了“汇合为一贯的斗争”的目标。

此外,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与湖南秋收暴动“汇合为一贯的斗争”也非常重视。比如,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要求湖南省委立即开展以下工作,以配合南昌起义。即:鼓动农民开始进行秋收暴动,鼓动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南昌政变,调动一切力量牵制敌军对南昌的压迫,并制定秋收暴动计划^{[23]45}。在整个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中,中共中央尤其希望在湘南有所作为,因此在8月1日起义爆发的当天,就向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发出指示,希望分给郭亮一团或二团兵力,并由其率领开赴湘南占据郴州、宜章、汝城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17]238}。10月12日,在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又要求起义部队之余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2]49}。同时,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在湘南地区发动秋收暴动提出了具体要求:组织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17]308};批评湖南省委“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23]61},认为“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17]350},并提出指示“湘南方面,仍须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17]352},等等。

从广东撤退至湖南的南昌起义部队后来成为湘南暴动的主要武装力量。当时,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近800人在朱德等率领下,经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打游击,并于11月转战至湖南汝城,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隐蔽在范石生部。1928年1月,朱德率部攻打宜章县城,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从而“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24]397}。在宜章暴动成功的影响下,湘

南各地的秋收暴动迅猛发展,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地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在湘南特委领导下,1928年3月湘南苏维埃政府成立。由此可以说,在湘南暴动中,南昌起义部队的作用功不可没。朱德后来描述道:我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24]397-398}肖克也有如下评价:“湘南暴动规模很大,震动了湘、粤各省。这是因为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湘南保留了地方党组织;一个是有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没有这两个条件的配合,湘南暴动不一定能引起震动,即便有震动,也搞不成那么大的规模。”^{[2]254}

为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州和永兴、资兴五地参加暴动的共8000余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三个师和两个独立团。这部分部队加上朱德、陈毅率领的2000余军队,最终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实现胜利会师。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农军共同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发,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希望看到的局面。正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给朱德等的信中提到:毛泽东所率领的农军驻扎在桂东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18]811}

(二)南昌起义促进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无论如何,井冈山会师一方面为“不得不退出了湘南”^{[24]398}的起义部队和农军提供了生存基础。就如黄克诚所说:“如果没有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接应,则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后来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都很难立足。”^{[25]45-46}另一方面,也为井冈山革命斗争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和壮大必不可少的条件。肖克曾经评价道:“没有井冈山会师,罗霄山脉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有那么大。”^{[2]254}当时,朱毛会师后建立的红四军,其主要力量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湘南农军,这部分力量“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增加五倍以上”^{[26]112}。这一点也正如陈毅于1929年9月1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朱毛军报告中所提到的:“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27]2}也正因此,石仲泉先生指出:朱毛会师后所创建的红四军领导成员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2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当中,南昌起义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上,除上述暴动外,在湖北,秋收暴动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黄冈、监利等地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地区领导的起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江西,先后爆发了信丰、南康、赣州、吉安吉水、泰和、万安、安福、永丰、峡江等县的武装起义,等等^[2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是由这些“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对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鼓舞、激励作用。1927年12月《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以“江西通信”形式,分“九月的农民斗争”“十月的农民斗争”“十一月的农民斗争”三个部分,报道南昌起义后江西修水、德安、星子、弋阳、鄱阳、临川、余干、万安、泰和等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江西农民认识到南昌暴动尽管短期摧毁了反动派的剥削统治,但“这次暴动,可算是江西农民的一帖兴奋剂”,并由此激起江西农民“蓬蓬勃勃伟大而英勇的革命斗争”^[30]。也正因此,中共中央指出:“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2]51-52}

结 语

对于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应该着眼于该事件的目的层面而不是立足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学界部分观点之所以认定南昌起义陷于失败,其基本逻辑依据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在潮汕地区遭遇挫折,没有实现在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动南昌起义,是将南昌起义置于秋收暴动总体部署之中,目的是重聚革命力量。这一目的,是通过具体的举措贯彻落实的,起义部队南下并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就是其中的具体举措。从目的层面即重聚革命力量这个角度看,尽管南昌起义部队没有能够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但在中共中央的总体部署下,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实现了“汇合为一贯的斗争”。这个目的达到了,南昌起义就不是失败的起义,而是成功的起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多地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6]

[参 考 文 献]

- [1] 毛达. 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J]. 布尔塞维克,1927(1):10.
- [2]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7-08-02(001).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7-08-02(002).
- [7] 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8] 郭清树.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简编[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 [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 [10] 刘国语.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 [11] 张侠. 南昌起义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2] 曾祥健,姚江,李进. 近十年来南昌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述略[J]. 社会科学动态. 1997(2):9.
- [13] 李维民. 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J]. 炎黄春秋,2003(8):5.
- [14] 冷溶. 南昌起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N]. 人民日报. 2012-08-03(017).
- [1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6] 王健英. 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17]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第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20] 叶左能.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 [21] 罗浮.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J]. 布尔塞维克. 1927(8):215.
- [22]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年):第4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3]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24] 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5] 黄克诚回忆录:上[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新编本):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7] 陈毅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28] 石仲泉. 关于南昌起义的一个科学论断[N]. 北京日报. 2012-08-06(019).
- [29] 典琦. 湘鄂赣川四省农民暴动之新发展[J]. 布尔塞维克. 1927(14):436-437.
- [30] 秋君. 南昌暴动后的江西农民运动(江西通信)[J]. 布尔塞维克. 1927(10):290.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Zhou Lisheng

(College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Nanchang Uprising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cademics tend to believe that the Nanchang Uprising failed because its main force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Chaoshan and did not establish a revolutionary base in Guangdong. In fact,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promoted each other to reunite revolutionary forces, which was the purpose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hel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anchang Uprising Army's move south to Guangdong to establish a new base was only a measure to that purpose. From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ose uprisings after the autumn harvest that year in various regions "converged into a consistent struggle" and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Nanchang Uprising was successful.

Keywords: the Nanchang Uprising; succeed; fail

[责任编辑:刘力]